

評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

徐欣宇**

作者：曹錦清

出版項：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772頁。

中國學界目前有眾多關於農村的調查報告，大部分鎖定某個地區的農村狀況作為調查對象，並以當前中國的「三農」問題作為探討的主題。其中知名的農村調查報告有于建嶸關於衡山的調查記事、¹陳桂棣及春桃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²以及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³等。其中《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最為血淚斑斑，揭發了農民所受到的壓迫。至於收錄〈衡山調查記事〉的于著，則是以研究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為主，沿著當年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路線，從政治社會學和政治人類學的角度，描述衡山農村一個世紀以來的政治關係、權力體系、政治控制、政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許多寶貴之意見，在此特別表達謝意。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¹ 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² 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³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治文化的變遷。于著之田野工作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對湘潭、湘鄉等縣進行廣泛的了解，第二階段則是將衡山縣作為研究的重點，〈衡山調查記事〉即是作者在衡山縣從事田野調查的工作筆記，以三個部分來看農村問題：1.農民集體對抗基層黨政事件；2.制度性錯位及地方權威的產生；3.村民、黨組織、理論界看法的分歧。

而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書則是以河南作為主要調查地域，間及於冀南邯鄲一帶，使用田野調查方法以及社會學理論，研究河南鄉村宗族社會、宗教信仰、文化特色以及市鎮變遷，收錄廣泛之調查，且不乏關於1949年前後、文革及改革開放等中國重要歷史時期的主題訪談敘述。全書以逐日調查實錄形式呈現，雖是日記體例的田野調查，但曹錦清並沒有預設立場，對於農村現象的調查沒有假設可能會遭遇到的問題：私人調查會引起農村基層幹部的嚴格防範和村民的警覺。不過也因其不受官方干涉，而更能表現其真實面。本書採用的視野是「向內、向下看」，把視野從中央政府移開，轉而進入中原農村內部。曹氏將他的調查日記加上諸多個人感想，將河南農村問題平實的表達出來。原以為作者如按照主題式整理，則更有整體感，更能好好的分析問題，但多次閱讀之後卻發現，本書之處理方式雖然有瑣碎之感，但是也更接近農村問題的核心，讀來有如在礦脈中撿拾鑽石。

書中所談到的不外乎幾個重要問題：中國的西化及現代化問題、地方政府幹部問題、農村超生問題、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本書記錄了豐富的三農調查資料，如：農民(農民收支、生活水準、農民負擔)調查數據，農業經濟(水利與農業、農村副業、經濟作物種植、農業技術以及農場經營)，



農村社會變遷與發展(土地承包制下的小農、地方政府與農民互動、富民工程與鄉村企業、人口與勞動力的外移、宗族社會與村民文化的變遷)等，都可提供學界新的研究材料。

中國農村一直是傳統社會的縮影，而農民又是中國所有族群中較保守的群體。雖然農民經歷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運動的洗禮後，似乎接受了進步的新觀念，而地方政府牢牢掌控農民在手中；但是改革開放後，農民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回復到傳統根深蒂固之觀念。其實農民未曾改變過，只是消極的抵抗這些政治措施。這樣看來，不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如何的想拔除這些所謂的封建餘毒，卻仍然力有未逮，政治力量與農民思想上的拔河，最後還是區居下風。

本書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討論中國自從五四之後，便一直努力的現代化，但是現代化的觀念始終和西化混雜在一起，變成了現代化就是西化，書中提到此觀念對現代中國的影響極大，而曹錦清對於許多學者將西方理論全盤應用到中國的情形，覺得不甚妥當，因為中國社會有其獨特性，自古中國並無所謂「市民社會」及「公共領域」的概念，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國家」就等同於「社會」，這和西方所謂的「國家」與「社會」是分離且相互對抗，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國人不管是從宗法家族制、公私合一的道德觀念與官本位的看法，都和西方不同，也因此不能將適用於西方社會的理論都全盤套用到中國。從另一方面來看，曹錦清也認為不光是學者，連城鄉幹部都對於現代化只有片面的理解：



他們⁴以為建道路造賓館，政府投資辦企業就是“發展經濟”，搞城鎮標準化，現代化硬件建設就是“現代化”。他們恰恰把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關鍵因素，即“效益”忘掉了，或忽視掉了。豪華賓館，只是“現代建築”，非現代化本身。⁵

書中有諸多部分提到此問題，曹錦清認為觀念上的改變，與其持續大規模的硬體建設，不如改良政治體制，但是政治體制的改革不易，主要是因為德治不足以治國，需靠法律來強力執行。書中提到：

現實政治所能期待者，一是當官而不作惡，二是作惡即能罷免。這就是說，政治必須走民主化、法制化的現代之路。並非法治優於德治，而是德治不足憑信，唯有求助於法耳。⁶

在德治不足以治國的時候，只好依靠法律作為輔助；在中國，因為官僚系統的行政效率不彰，加上許多人為謀私利，以至於法律也無法彰顯。吳思的《潛規則——中國歷史上的進退遊戲》、《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等作品所要說明的就是這種狀況。⁷黃仁宇也認為所謂的德治也僅僅是個空號，但是所謂的亂世用重典也未必可靠，基本上還是要回歸到法律嚴格執行的基礎上才有用，正如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所提到的：

可見我們帝國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脫節，道德倫理是道

⁴ 此處指幹部。

⁵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頁512。

⁶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頁130。

⁷ 吳思，《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台北：究竟出版社，2003）。

德倫理，做事時則另有妙法。再要在陰陽之間找出一個折衷點而為公眾接受，也就越來越困難了。⁸

村里幹部問題是個更難以解決的問題，改革開放後，因為經濟起飛，工作機會增加，一般村民根本不想當村幹部，寧願到大城市謀生，而想當幹部卻無行政能力的人也無法當幹部，最後能當上幹部的都是有強大宗族撐腰的人，而最後這些人多數為私人牟利。⁹實際上改革開放前便是此種狀況，何清漣〈農村基層地方惡勢力的興起——與王旭喬榷〉一文提及：「以中國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農村基層幹部產生的機制為例：被選的幹部都是社會的邊緣人物。」¹⁰但事實上整個結構並非如此簡單，吳思曾在《潛規則——中國歷史上的進退遊戲》一書提及，中國社會的政治結構是一面篩子，會主動將不適合處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好幹部或是適任者淘汰，留下想當幹部而又不是很清明的人當官，吳思認為好幹部和壞幹部的混合比例並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選擇的結果，這是整個中國政治結構所造成的自然淘汰方法。¹¹

本書最後一個重要的課題是一胎化的影響，紀思道認為因為一胎化的關係，中國現在的女性地位比以前平等，而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因毛澤東提倡的「婦女撐起半邊天」，使得女性地位大為提升，不管在家務上或

⁸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台北：食貨出版社，1994），頁199。

⁹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頁95-96。

¹⁰ 劉青峰、關小春，《90年代中國農村狀況：機會與困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164。

¹¹ 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上的進退遊戲》（台北：究竟出版社，2002）。

是在工作上都不同於以往。¹²但在曹氏的紀錄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在河南的農村中，農民仍受限於傳統價值觀念的束縛，不管超生罰款是如何的重，或是小孩子變成黑戶，都一定要生男孩子，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現象，一胎化提升了女性地位，中國共產黨也提倡男女平權，農民本身也知道超生是不好的，對自家會造成負擔，那為什麼農民們還是要堅持生男孩呢？難道共產黨執政以來所推行的政策竟無法產生任何效用嗎？本書有關農村的超生問題佔據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可以想見農村超生問題是如何的嚴重。本來一胎化的目的是希望減緩社會壓力，促進資源效益和環境效益，但是計劃生育實施迄今已出現不少負面效應：

1. 人口高齡化。
2. 獨生子女教養問題。
3. 性別比失調。
4. 人口素質逆淘汰。
5. 徵兵困難。
6. 幹部與群眾矛盾日益尖銳。

依調查所見，超生部門是農村工作中最重要的部門，即使想要精簡人員，也是不易做到的事，農民本身也知道超生不好，但是農村勞動是需要男性勞動力的，傳宗接代也須男生，於是眼前的現實狀況超過一切，罰款反而是最不被考慮的事，超生問題和地方農戶比例是相關的，人丁興旺是家庭勢力的來源，可是事實上超生反而造成了農家鉅額超生罰款的負擔，

¹² 紀思道，《東方驚雷》（台北：時報出版社，2004），頁318。

小孩又多為黑戶，無法求職求學，官方也必須對超生做出處罰，有的地方部門採取強制到超生農戶家去搬家具，有的地方採用連坐法，使農民苦不堪言，但是官方也會遇到不繳錢的刁民，此時又沒有確切的處理辦法，官方也滿腹苦水：

沒有一個鄉鎮能夠做到一個也不超生的，所以為了應付檢查，各種手段都使出來了。再說得徹底一點吧，龐大的計劃生育部門不是靠超生罰款來維持的嗎？真的做到一個也不超生，不就斷了計生部門的財源了嗎？¹³

現在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十億以上，1982年中共中央做了一次最嚴謹的人口普查，證實中國的人口數超過十億，¹⁴當然這數字已經是官方所能做出的最接近真實人口的數字，實際上還有眾多潛伏在水面下的黑戶。目前中國無法短時間快速轉化成工業化國家，而廣大的農村中，除農業外，不易發展其他的產業，因此農村大部分的人口仍需從事農業，可是實際上中國的目前耕地面積已無法再增加，反而因都市化而逐漸縮減中，最後不易求生的農民只好流竄到大城市，造成所謂的盲流問題，這也是目前中國一大隱憂。

曹錦清在最後提出了他個人思考最多的兩大問題：1.土地承包制下的小農問題。2.地方政府與農民關係。本書的調查重點之一，旨在觀察土地承包制對於小農生活的影響，並且試圖進一步比較「集體制」以及「兩田制」制度上的利弊，以及對於中國農業發展可能的意涵。曹錦清認為農民

¹³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頁510。

¹⁴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台北：時報出版社，2001)，頁939-942。

的善分不善合，造成農民無法更進一步的互助合作幫助，以宗族形成的親情網絡反而會使問題惡化，親情的關係與聯合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合作與聯合，必須要以另一種共同利益為優先的自治團體或自治社會形成來使中國現代化，因此需要培育農村人才，教育農民。筆者以為中國人的親情關係網絡並無法被所謂的自治團體所取代，人類無法脫離血緣的人際關係網絡而活，尤其在中國，當政府的控制結構鬆動的時候，其控制力已不足以完全掌控地方人民的生活，反而會出現其他的組織來填補此空缺，像宗教、社團、宗祠等。

本書所最想瞭解的問題是：毛澤東所一手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長時間的思想改造後，為何農民還是保持著傳統中國社會的觀念？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成功的散布到全中國，使得農民幾乎都可以將共產主義的辭彙琅琅上口，使農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新觀念，那麼為什麼就不能改變農民的傳統觀念呢？這似乎是所謂的「理性上可以理解，可是情感上卻不能接受」的問題。農民也知道超生不好，甚至要負擔鉅額罰款，可是情感上還是希望有男孩來傳宗接代。

綜合來看，中共在改革開放後發生了幾個重大問題：貧富差距的擴大，國營企業虧損連連，經濟轉型中的脫序行爲，幹部腐敗，經濟犯罪，人口成長失去控制，城市超過負荷。要解決這些問題，並不能光一味的將西方觀念及組織方式全盤複製到中國社會上，而忽略中國特有的環境狀態及傳統觀念，而是需要找出一條適合現代中國的道路。

(本文於 2005.10.31 收稿，2005.12.10 通過刊登)

